

经济危机与经济学的危机

——从波斯纳的研究切入

ECONOMIC CRISIS AND ECONOMICS'S CRISIS:

A Critique Inspired by Richard Posner's Studies

沈明*

内容提要：作为一九三〇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的最严重经济衰退，始于二〇〇八年的经济危机事实上已经成为另一场经济萧条。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的系统风险，因此它标志着以自由市场竞争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遭遇了一次重大失败。除了担负经济监管职能的政府之外，经济学职业界对这场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去三十年间的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理论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重大缺陷，有用的理论建树乏善可陈。经济学职业界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后的表现均令公众大失所望，凸显了这一学术领域所面临的危机。当下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危机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教训与启示。中国经济学界尤其应当警惕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认识论上的谬误和实践中的危害。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约束意识形态前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面对并致力于解决真实世界中的问题，并不断寻求新知，追求自我超越。

Abstract: As the most severe economic recession after the Great Depression, 2008 economic crisis has turned out to be another depression.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the calamity is the internal systematic risks of capitalist economy; the crisis therefore symbolizes a remarkable failure of capitalism whose key feature is free market. In addition to governments in charge of economic regulation, economics profession must claim an inescapabl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bust. In past three or so decades, mainstream economics, particularly macroeconomics and financial theories, have demonstrated serious methodological flaws, hence little useful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Economics profession disappointed the public very much by its both ex-ante and ex-post performance in regard of the crisis, which suggested economics profession's own crisis. Current crises of economy and economics provide lessons and revelations for Chinese economy and economics studies. Chinese economists ought to pay alerted attention to epistemological fallacy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and its harms to economy. Economists and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are expected to constrain their ideological preconceptions, and to pragmatically face and overcome problems in the real world, while marching toward new knowledge and self-transcendence.

关键词：经济危机 萧条 经济学 方法论 意识形态

Keywords: economic crisis, depression, economics, methodology, ideology.

能干事的人在干事，不能干事的人就教别人干事。——萧伯纳¹

能做科学研究的人在做研究，不能做研究的人就空谈其方法论。——保罗·萨缪尔森²

*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拉贾瓦利研究员 (Rajawali Fellow)。我特别感谢苏力、冯象、高鸿钧三位老师对本文初稿细致深入的评论；但此文的立场和潜在的任何疏误均属于作者本人。

¹ Bernard Shaw, "Maxims for Revolutionists," in *Man and Superman: A Comedy and a Philosophy*, New York, NY: Brentano's, 1904, p. 230.

一、 导论：一位法学家的经济危机研究及其学术寓意

二〇〇九年一月九日，理查德·波斯纳法官迎来了他的七十大寿。这个年纪，在古人看来，即便“从心所欲不逾矩”，总归是进入了“古稀之年”。但精力充沛的波斯纳，尤其是他的如椽健笔，让人想到的却是“人生四十才开始”的西谚。波斯纳的同事伊文思（Terence T. Evans）法官曾说，波斯纳“写的书比很多人毕生读的书还多”³，看似夸张，其实并不夸张：肩负联邦第七上诉巡回法院的本职工作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兼职教席的同时，二〇〇九年波斯纳又出版了两本新书。⁴ 其中《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问世后引起了媒体、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⁵ 《纽约时报》一篇书评文章说：“如果不是发现作者是波斯纳，人们一定会吃惊，怎么竟然会是一位联邦上诉法官首先出版了一本关于这场金融危机的综合著作。波斯纳是……这个国家里最博学而且思想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⁶ 这位著名法官的经济危机研究是本文的缘起，它也蕴含着直接关涉本文主旨“经济学危机”的学术寓意。

二〇〇八年三月，美国著名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陷入破产困境，标志着金融危机的形成。九月中旬，随着华尔街巨头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经济危机在美国全面爆发，并逐渐恶化、蔓延成为一场全球经济萧条（depression）。就讨论当下这场经济危机来说，“经济萧条”，在金融界甚至整个商业界还有学术界的很多人心目中依然是一个禁忌语。但波斯纳在《资本主义的失败》这本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这场危机可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周期性来临的那种经济衰退（recession）——因为“任何一个经历过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经济温和下滑的人都不会认为那种温和下滑堪与当下情状相比”⁷——而是一场“我以及今天活着的大部分人的一生中发生的美国最大的经济灾难”（第5页），即该书副标题断然命名的“经济萧条”。⁸ 为什么是经济萧条而不是一般的经济衰退？在二〇〇九年六月初《经济学家》杂志的一次采访中，波斯纳简明地归纳出了三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是人们对这场始于去年九月（尽管经济衰退在比那还早九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了）的经济危机感到极为焦虑并广泛关注。这场——被委婉地称为——“严重经济衰退”所激起的恐惧是我这辈子在经济领域中从未见过的。第二点原因是政府

² Paul A. Samuelson, “My Life Philosophy: Policy Credos and Working Ways,” in Michael Szenberg ed., *Eminent Economists: Their Life Philosoph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40.

³ *Bankcard America, Inc. v. Universal Bancard Systems, Inc.*, 203 F.3d 477 (7th Cir. 2000), note 1.

⁴ Richard A. Posner, *A Failure of Capitalism: 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Gary S. Becker & Richard A. Posner, *Uncommon Sense: Economic Insights, from Marriage to Terror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此外，当年他还更新出版了《法律与文学》第三版：Richard A. 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 3r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⁵ 该书曾进入“亚马逊”网络书店畅销书总榜的前一百名，还一度登上《纽约时报》非小说类图书排行榜。

⁶ Jonathan Rauch, “Capitalism’s Fault Line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17, 2009, p. 11.

⁷ 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直接在正文中标出页码。

⁸ 波斯纳生于一九三九年。这场危机被很多人视为一九三〇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最为深重的一场经济灾难。参见，例如：Nouriel Roubini & Stephen Mihm, *Crisis Economics: A Crash Course in the Future of Finance*, New York, NY: Penguin Press, 2010, p. 1; Joseph E. Stiglitz, *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p.1; Amartya Sen, “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5, 2009; Jeffrey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Bankers, Bonuses, Ideology, and Ignorance,” in Jeffrey Friedman ed., *What Caused the Financial Crisis*,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p. 1.

为遏制“衰退”加快经济复苏所投入资金的巨大规模。这样大的货币代价是自一九三〇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历次经济衰退中从未有过的。与此相关的第三点原因是，政府为努力使我们走出经济恶性循环而投资、贷款、担保所付出的数以万亿计的美元所隐含着造成严重经济余震的风险——至少这个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风险了。其余震的表现形式可能是沉重的税收或者政府经费的大幅削减，不过可能性更大的余震是通货膨胀，甚或是以更高的利息率向外国政府和投资者借更多的钱。⁹

这最后一点，即政府救市措施的副作用，尤其容易为人们所忽视。波斯纳的评论语带机锋：“不能指望政府官员时时刻刻保持诚实。”（第 172 页）紧要关头，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对媒体和“专家”包括学术界人士也不能如此指望。

尽管经济“萧条”和“衰退”之间并无清晰界线，而且“萧条”本身是一个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然而波斯纳还是尝试着给出了它的定义：“生产急剧萎缩，并引起或威胁将引起通货紧缩，并引发广泛的公共焦虑，以及在政治、经济精英中引发危机感——消除危机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第 3 页）¹⁰ 这个定义乍看起来略显抽象，不过通读全书之后会发现，它是作者对经济危机进行多维分析后归纳出来的结论，其内涵涉及从微观到宏观、从经济到政治、从物理到心理、从原因到后果等多方面的内容，值得玩味。事实上，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就在此书出版前后，随着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美国及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纷纷出台规模庞大甚至堪称空前的救市措施。人们才渐渐意识到这场危机不同寻常的深重程度，¹¹ 从而使“萧条”这个“尘封已久的词汇”在媒体和学界成为热度渐升的关键词。但是，直到《资本主义的失败》一书出版的时候为止，甚至直到经济危机爆发三年之后的今天为止，

⁹ “Seven questions for Richard Posner,” June 6, 2009.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democracyinamerica/2009/06/seven_questions_for_richard_po. 最后访问日期：2011 年 12 月 12 日。（本文注释所涉及的网络链接地址均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验证有效，以下不再一一注明最后访问日期。）

¹⁰ 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讲，界定经济萧条有两个常用的指标：GDP 下降超过 10%，或者 GDP 连续下降超过三年。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美国〇八经济危机尚未达到“萧条”的程度。不过，从定性分析来看，根据经济学家 Saul Eslake 的研究，衰退与萧条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经济下滑的幅度或持续的时间，也表现在触发原因的不同：典型的衰退通常发生在紧缩货币政策之后，而萧条的前奏则是资产与信贷泡沫的破灭、信贷紧缩、物价下降。相应地，应对衰退和萧条的经济政策也有所不同：前者一般只需要低利率即可应对，而后者则需要综合的财政政策加以解决。参见“Diagnosing Depression,” *Economist*, Jan. 1, 2009, p. 57; Saul Eslak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Recession and a Depression?” <http://www.anz.com/resources/e/4/e459fa004e4a38ffa19bab93c5571dd1/CO-Article-Difference-Recession-Depression-Nov-2008.pdf>. 二〇〇八年以来经济形势的发展倾向于支持定性分析的判断。也参见 Richard A. Posner, “Let’s Be Honest: We’re in a Depression, Not a Recession, and There’s No End in Sight,” <http://www.tnr.com/article/economy/94055/posner-recession-depressions-entitlements>.

¹¹ 美国二〇一一年（根据第一季度的数据推算）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将比危机之前的二〇〇七年下降近 3%。二〇〇九、二〇一〇年美国的失业率分别为 9.3% 和 9.6%（从二战结束到二〇〇八年，除一九八二年外，美国的年度失业率从未超过 8%），直至二〇一一年六月，失业率仍为 9.2%。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菲尔斯坦对经济复苏持悲观态度，他认为美国经济“比你想的还要糟糕”。Martin Feldstein, “The Economy Is Worse than You Think,”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1, 2011,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3657404576363984173620692.html>. 二〇〇七至二〇一〇年间，美国人的平均消费支出下降了近 8%（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二〇〇三至二〇〇六年间平均消费支出增长了 8.2%），见“Hard Times,” *Economist*, Oct. 25, 2011,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dailychart/2011/10/us-consumer-spending>. 此外，人们也不应对现阶段的某些经济复苏迹象过分乐观，因为经济复苏本身需要付出成本或者说代价，而这种代价有的时候是隐性的，是不“完全坦诚”的政客、政府经济学家和媒体不愿公众知道或者关注的。还有一个与本文主题没有直接关联但并非不重要的相关事实是，经济危机及其之后的复苏会使社会付出政治代价。

新闻报章和学界人士在提及“经济萧条”的时候，大多仍是历史维度的即关涉一九三〇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讨论，或者是关于萧条经济学及相关金融理论的一般或抽象研讨；对当下这场经济大萧条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政治经济影响加以综合研究的学术著作，仍不是很多。不过，描摹、阐释此刻正在展开、因而充满变数的历史，肯定要承担很大风险，波斯纳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知难而上？有两方面的原因：前辈学者费雪和凯恩斯在一九三〇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写出的经典作品成为激励波斯纳研究的榜样；更重要的原因是，“后见之明会改写历史”（第7页）。或许是凭借着学术魄力和自信心，波斯纳选择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历史，并因而间接地将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奉献给“后见之明”的解剖刀。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以二〇〇八年九月中旬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作为经济危机爆发的标志，那么到二〇〇九年二月初，《资本主义的失败》收笔的时候，经济危机才仅仅行进了四个多月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一本书，是难能可贵的。当然，早早收笔对这样一场在经济史上需要浓笔重彩书写的重大事件来说，肯定要留下难以逾越的局限。为此，波斯纳特意在《大西洋》杂志网站上开设了一个博客，对经济危机进行“跟踪”写作，不断地补充、更新该书内容，随后出版了《资本主义的失败》的“续集”《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后书大体上接续了前书的分析（指出经济萧条会有政治代价），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把解剖刀从经济生活切入政府结构和政治文化。¹²

毋庸讳言，作为法学家的波斯纳对经济危机的研究绝非无懈可击，可能存在种种缺陷。¹³ 波斯纳的职业是法官和法学教授，他并没把自己当成经济学家，至少不是职业经济学家，¹⁴ 在全国公共电台广播访谈中，他说为了研究经济危机，自学了不少东西。¹⁵ 他坦言自己不是宏观经济学家，研究出自外行人的视角，但强调这同样可以是一种有价值的视角。确实如此。外行未必没有用，“内行”恰恰坏了事情。波斯纳曾批评过公共知识分子“更多公共

¹² 就像波斯纳自己说的，前一本书标题中的“失败”一词吓着了某些读者，要不然的话，我猜想，他可能会把后一本书命名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失败”的。参见 Richard Posner, *The Crisis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 经济危机与美国民主政治的纠结关系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笔者拟另文讨论。值得在此一提的是该问题近来以一种颇为戏剧化的方式在美国国债危机中表现出来：二〇一一年七月三十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论述美国债务危机的一个讲话中说：“美国可能失去其 AAA 信用评级。这不是因为我们无力偿债——我们有这个能力——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与此能力相配的 AAA 级别的政治制度。” Barack Obama, “Acting Responsibly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7/30/weekly-address-acting-responsibly-behalf-american-people>. 在此讲话之后第六天，即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五日晚，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将美国政府的信用级别由 AAA 下调至 AA+，终结了其保持了七十年之久的无违约风险的 AAA 信用记录。降级的主要理由是美国的政策制定和政治制度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都在衰减。参见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ong-Term Rating Lowered to ‘AA+’ on Political Risks and Rising Debt Burden; Outlook Negative,” <http://www.ft.com/cms/af2c4fac-bfc2-11e0-90d5-00144feabd0.pdf>. 有趣的是，该信用降级决定立即引发了奥巴马的批评：“我们不需要一个评级机构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进行平稳、长期的赤字削减……市场仍旧会有涨有落，但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不论某机构怎么说，我们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一直会是一个 AAA 级别的国家。”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ugust 8, 201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8/08/remarks-president>.

¹³ 例如，一个比较猛烈甚至极端的批评：David Campbell, “The End of Posnerian Law and Economics,” 73:2 *Modern Law Review* 305 (2010).

¹⁴ 参见 John Cassidy,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osner,” *Rational Irrationality*, <http://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johncassidy/2010/01/interview-with-richard-posner.html>.

¹⁵ “Judge No Longer a Believer in Unfettered Markets,” *National Public Radio*, May 9, 2009,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03979139>.

更少智识”的越界写作，¹⁶ 而他自己当然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可能存在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当仁不让地指出了这一点。¹⁷ 可是经济学家的这种反批评并不能遮蔽经济学及其“非公共”的“专业”知识分子即经济学职业界在这场危机中所暴露的“系统性失败”。¹⁸ 在这场一生一遇的经济危机伊始，在大部分职业经济学家虽未必惊慌但肯定失措的时刻，由一位没有受过正规经济学训练但热爱经济学的法学家率先对危机给出一个虽然可能不够深刻但随着时间推移被证明为大体正确的、相对系统和全面的理论阐释，这一事实本身就蕴含着让经济学职业界尴尬的意蕴。

本节所述波斯纳法官的经济危机研究系本文写作缘起。第二节从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两方面讨论〇八经济危机的根源，并简要辨析学界在原因分析上的分歧。笔者原则上采纳波斯纳的解释，将危机根本原因归于以自由竞争为基本属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所蕴含的系统风险。在确定原因的基础上进而讨论责任的归属，由此将论域由经济危机本身转向经济学及其职业界的危机。第三节着重探讨经济学在危机中的失败及其方法论和制度根源，兼及经济学的社会功能及其局限性。第四节则进一步在思想根源层面上讨论因危机而重现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纷争，并使论域回归中国，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失误和现实危害。第五节为结语，扼要阐述了西方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失败表现为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的教训和启示，强调学术研究不能因意识形态而固步自封，应在求真求知意志的驱动下不断创新，寻求自我超越。

二、资本主义的败绩：简析经济危机的原因

关于〇八经济危机，新闻界、金融和商业界、学术界人士已经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分析和评论。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触发经济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我赞同波斯纳的诊断：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系统风险系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可以说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遭遇的一次失败。如果止步于如此抽象的回答，当然无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场危机，因为，尽管它肇始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危害波及全世界，包括中国。既然谈到“资本主义的失败”，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有两个主要问题特别值得关注：首先，〇八危机表征的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怎样的失败？西方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自由市场制度遭遇了败绩，是否意味着应该颠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这块基石？是否可能颠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有少数保守派经济学家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恶果。这里所展现出来的奇特意识形态反差实在可圈可点。概而言之，第一个问题是：这是何种资本主义的失败？其次，我们可以稍作引申，探讨一下“失败”的内涵。因为，这“失败”在事实上必然是复数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历来不会局限在经济领域，它可能——就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来说——并且已经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某些领域的学术危机。正如很多批评者指出的，也是部分经济学家所承认的，除了自由市场自身的缺陷之外，〇八危机还彰显了保守主义和经济学界的“失败”——这既是经济危机的后果（因为在危机发生之前人们并不知道这种意识形态和学术是“失败”的），

¹⁶ 参见 Richard A.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 5.

¹⁷ Robert M. Solow, “How to Understand the Disast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14, 2009.

¹⁸ David Colander *et al.*,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ystematic Failure of the Economic Profession,” in *What Caused the Financial Crisis*, *supra* note [8], p. 262.

也是其远因。这里所谓的“失败”在程度上或有争议的余地，但终究不是小到可以忽略的地步。因此，我们可以把第二个问题归结为：谁之失败？显而易见，上述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笔者的提问方式略带修辞特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助这样的问题视角展开讨论。本节讨论前一个即“何种资本主义”的问题，从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两方面加以阐述；后一个问题即“谁之失败”的追究，留待第三节专门分析。

（一）直接原因：高风险信贷与低储蓄率

○八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可以从危机过程本身体现出来：起源于房地产市场的经济泡沫经由高风险投机性借贷活动——其中的典型就是恶名昭彰的“次级”抵押贷款，即“针对很可能发生债务违约的高风险人士的抵押贷款的委婉语”（第 25 页）——推波助澜而愈演愈烈，逐步蔓延吞没了整个金融产业，并最终破灭。与此相伴的经济基本面是股市暴跌和个人储蓄严重不足，在这些条件共同作用下，经济危机乃至萧条就成为无法避免的灾难了。复杂经济系统的因果关系环环相套，概括来说，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高风险信贷和个人储蓄的严重不足两个因素的并存，因为在此条件下，泡沫破灭和通货紧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它们一旦到来，经济运行就仿佛结成了死结，无论市场机制还是政府调控都无力回天。

虽然经济泡沫既不是新闻也不是新知，但波斯纳通俗易懂的解释依然给中国读者提供了联想的空间：“泡沫是指，某类资产的价值骤然升高，而这一变化又不能通过任何决定资产价值的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例如由人口增长或者产品质量提高引起的需求增加——得到解释。不过，泡沫经常是由错误的信念造成的，错误地相信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某一市场，甚或整个经济正步入一个增长的新时代，基于例如技术进步的原因。实际上，错误的信念很可能是泡沫形成的主要原因。”（第 18 页）当然，有关经济泡沫的知识在危机的关口对乐观论及其信奉者来说更有现实的警示意义。其实，早在二〇〇四年，《经济学家》杂志就曾有如此振聋发聩的报道：“房地产业的乐观主义者指出，《经济学家》杂志之类的灾难论者一年以前就在为地产泡沫痛心疾首，然而价格还在继续攀升，乐观主义者通过指出这样的事实来驱散那些恐惧。但是价格的攀升不是使房地产市场更安全了，而是使它更脆弱了。泡沫的第一定律是，它们膨胀的时间比任何人的预期都长得多。第二定律是，它们最终会破灭。”¹⁹ 诚然，泡沫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经济萧条，但在政府监管不力，使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界限近乎消融的条件下，次贷等高风险金融投机活动盛行，使经济泡沫异乎寻常地膨胀，但却被经济繁荣的假象遮蔽，当启示（revelation）时刻到来之际，灾难异常深重。这个故事无需多言，人们已经耳熟能详，其通俗版本即巴菲特的名言：“只有在潮水退去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谁在裸泳。”²⁰

危机的直接原因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平衡关系对萧条的最终促成非常关键（但这一因素在经济萧条降临之前被人们忽视了），因为“储蓄率越高，由银行破产造成借款难和股票市场下跌造成财富损失二者所引发的对商品和服务需求急剧下降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人们会汲取自己的储蓄以维系某种近乎惯常水平的消费。”（第 28 页）中国的经验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公布的数字，中国总储蓄率在二〇〇一到二〇〇八年间上升了 12.8%，二〇〇八年的总储蓄率已经高达 51.3%，而同年美国储蓄率为仅 12% 左右。从结构上看，二〇〇八年，中国居民个人储蓄率为 38.3%，而美国的个人储蓄率是 4.5%；中国的政府储蓄率是 43.5%，美国政府储蓄率二〇〇〇年以来有五

¹⁹ “Homing in on the Risks,” *Economist*, June 4th, 2004.

²⁰ Warren E. Buffett, “Berkshire Hathaway 2001 Chairman’s Letter,” February 28, 2002, <http://www.berkshirehathaway.com/2001ar/2001letter.html>.

年是负值，二〇〇八年更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下跌至负 16%。²¹ 当然，造成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²² 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乏政策与意识形态之争，但从后见之明来看，高储蓄率客观上确实对中国经济起到了庇护作用，减弱了危机的冲击力。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高储蓄率所造就的资金储备可以避免对经济具有灾难性破坏效果的通货紧缩。

经济泡沫的形成和破灭在过去几十年间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堪称商业周期运行的常态。但这一次的泡沫及其破灭却是与以往不同的。已经出现了若干不祥的征兆，表明这次面临的并非以往那种波澜不惊的经济衰退：二〇〇九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下跌了 2.63%，这不但是过去二十年间美国 GDP 首次出现下跌，²³ 而且这一指标比美国一八七一至二〇一〇年间的 GDP 年平均增长率²⁴长期趋势线低 6.15%，这样的下跌幅度是二战结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更让人担忧的是，“几乎所有关于经济势态的预测最终都被事实修正了：结果要比预测的糟糕，这不仅直接助长了悲观主义，而且还通过揭示金融专家对事态只有有限的把握，间接助长了悲观主义；如果他们并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就不太可能为遏制经济下滑提供较多的指引。”进而言之，这场经济危机的核心是金融危机，而不是什么其他类型的危机，这格外危险，因为“一九三〇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通货紧缩时期就是由一场与此类似的金融危机拉开序幕的”，而且，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会使中央银行的主要救市措施——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息率来刺激经济活力——失灵，因为这些宏观调控手段必须依赖作为金融中介机构的商业银行才能发挥作用。毫无疑问，银行业在金融危机中的崩溃大大削弱了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政府拯救经济的主要手段不起作用了，然后怎么办呢？回答是：抱歉，“就只能靠忍耐挺过去了，因为 [政府] 的工具箱里已经空空如也。”（第 21、22、141 页）更加糟糕的是，金融危机已经从美国蔓延到全世界，这一方面预示着国际贸易的萎缩，使各国经济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会使危机中的各国自顾不暇，难以通过国际资本信贷来解决棘手的通货紧缩问题。此外，促成这场经济危机的还有一些貌似偶然原因，比如它在总统竞选期间发生（而且任期即将届满的是一位不再可能连任的总统），并在新老总统交班期间恶化，不论这一“巧合”是否可归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某种缺陷，客观上它都给美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造成了格外不利的影

（二）深层原因及相关学术论争

从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入手再深挖一下，就看到了这样一些间接或深层原因：房地产泡沫、极低的利息率、复杂的金融工具，政府金融监管的萎缩，以及金融市场存在着阻碍对风险产生有效反应的复杂因素。²⁵ 如上所述，因果关系环环相扣，深层原因和直接原因之间

²¹ 郭庆平：《中美储蓄率的比较与国际失衡》，全球智库峰会“重建平衡——全球储蓄与消费”分论坛，二〇〇九年七月四日，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0704/11466440140_2.shtml。

²² 除了人们常常谈论但不易确证的文化原因（如东亚文化崇尚节俭和储蓄）外，储蓄率高的直接原因是，作为——尚未达到“福利资本主义”境界的——经济和政治后发国家，中国的医疗、教育、失业、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事实上颇为孱弱。人们深感有必要储蓄以求保障日后的重大消费支出，并备发生意外急需时使用。这一事实所反证的（福利或发达）“资本主义”的失败颇具反讽意味：失败是需要资格的。

²³ 美国二〇〇九年的 GDP 已经比上年有极为微弱的下降，但在统计学上可以忽略不计，视其增长率为零。

²⁴ 该 220 年间美国实际 GDP 的平均年增长率为 3.75%。数据来源：Louis Johnston & Samuel H. Williamson, “What Was the U.S. GDP Then?” MeasuringWorth, 2011. <http://www.measuringworth.org/usgdp/>。

²⁵ 参见《资本主义的失败》，同前注[7]，第 61 页；Raghuram G. Rajan, “H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de the World Riskier?,” in *The Greenapan Era: Lessons for the Future*, Kansas, MO: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2005, pp. 313-369.

距离并不远：银行借贷的特征是长期贷款短期借款，由此形成了银行业或更宽泛地说金融业的内在风险，而信贷又位于资本主义经济——其实是所有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波斯纳的核心观点是，这场经济灾难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的败绩，而不是易于避免的错误、非理性、金融界人士的愚蠢或人性的贪婪造成的。这种立场或可堪称独树一帜，也最有争议。波斯纳承认情感之类的东西确影响人的经济行为，但这并不必然是甚至通常不是非理性，他举例分析了承担商业风险、从众等行为，认为它们通常不能纳入“非理性”的范畴。波斯纳这样反问：“市场参与者犯了很多错误，但这是市场过程的常态。有什么时代不是这样的吗？”（第160页）他断言，要解释泡沫经济的发展和破灭，根本不需要引入“非理性”作为理由。在前述《经济学家》访谈中，他甚至说：“我并不觉得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之间的区分有什么用。人就是那个样——一般情况下，他们偏好获得更多好东西更少坏东西，不过他们也是情感的动物，只能凭借有限的信息和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采取行动。在确定政府的适当角色的时候，必须把这些有关人性的事实考虑在内。”

波斯纳这一立场源自他对近些年来行情日涨的行为主义经济学的质疑和批判态度。有评论者称《资本主义的失败》是理性选择和行为主义两派经济学的“哲学宿怨”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爆炸性宣言”，²⁶ 虽然未免言过其实，但波斯纳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偏爱和对行为经济学的怀疑与保留（当然不是全盘否定）确实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九八年，就在发表卓尔斯、桑斯坦和泰勒的经典论文《法律经济学的行为主义进路》²⁷的同一期《斯坦福法律评论》杂志上，紧随其后的就是波斯纳的批评文章《理性选择、行为主义经济学与法律》。他在此文中犀利地指出：“行为经济学是根据其研究对象而非研究方法界定的，而其研究对象仅仅是理性选择模型（或至少是最简单的理性选择模型）所无法解释的现象集。如果这类现象中有很多彼此没有关联，就像人类不能食用的对象集包括石头、毒菌、雷电、毕达哥拉斯定理一样，那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对某一理论在经验领域中的遭遇的种种失败进行描绘、阐述、分类，是一种有理据的、重要的学术活动。但是它并不构成一种替代性的理论。”²⁸ “替代性的理论”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要点：行为经济学在理论上无法、在事实上也没有与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构成“针锋相对”，因为二者处理的多是不同的问题，因此要形容行为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之间的关系，“补充”可能是比“替代”更恰当的词。²⁹ 具体来说，行为经济学与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分歧是理性问题，前者试图以“有限理性”来取代（或“补充”）后者的理性概念，但可行性和价值实在有限。³⁰ 波斯纳早就把理性定义为手段适合

²⁶ Guy Sorman, “The Rational Crisis,” *City Journal*, 15 May 2009, <http://www.city-journal.org/2009/bc0515gs.html>.

²⁷ Christine Jolls, Cass R. Sunstein, Richard Thaler,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 50 *Stanford Law Review* 1471 (1998).

²⁸ Richard A. Posner, “Rational Choice,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he Law,” 50 *Stanford Law Review* 1551, 1559-1560 (1998).

²⁹ 卓尔斯、桑斯坦、泰勒在对波斯纳批评的回应中就说，他们和波斯纳之间的“同”远大于“异”。Christine Jolls, Cass R. Sunstein, Richard Thaler, “Theories and Tropes: A Reply to Posner and Kelman,” 50 *Stanford Law Review* 1593 (1998).

³⁰ 否认或批评理性选择范式经济学的思潮可谓由来已久。在行为主义法律经济学之前，著名的例子如科斯，他认为，理性选择（及其目标效用最大化）简直把人降格为动物了，人类选择行为的机制最终要由社会生物学家来揭秘。Ronald H. Coase, “The Relevance of Transaction Costs in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in Francesco Parisi & Charles K. Rowley eds., *The Origins of Law and Economics: Essays by the Founding Father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5, pp. 199-201. 但作为经验观察所反复验证的社会事实的理性选择行为本身和驱动该行为的深层生物学原因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在我看来，科斯等反对理性选择范式一派学者恐怕打错了板子，因为“理性选择”，如科斯的观点所隐含的，并不是经济学家的发明——

目的，³¹ 这个定义也许不够精致，可是在理论适应性和解释力上还是比大量依赖心理学实验的行为经济学好多了。

与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相比，学术界对其深层原因的分歧颇大。在这一点上，波斯纳拒绝以行为经济学为代表的心理阐释及其隐含的道德批判意味。那么，对行为经济学的质疑与批驳是否反映了波斯纳——昔日的法律经济学旗手——在后浪推前浪的学术潮流中变得落后、固执、保守了呢？抽象地说，完全有这种可能；可落实到具体学术论争上来看，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波斯纳本人的学术立场并非一成不变，恰恰相反，这场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对他的经济思想有很大触动：两本研究经济危机的著作标志着他在政治“频谱”上有一个从“保守”到“自由”的明显位移。他本人对此直言不讳，公开撰文，称自己“变成了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这一表象的背后当然就是他个人经济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变化。如上所述，在晚近的访谈中，他甚至走得更远，试图抛弃“理性/不理性”的二元范畴，大概厌倦了那些总是让人争论不休的抽象概念，要回到人性本身。此外还应注意，学界在危机深层原因上的分歧并不仅仅是理论之争，而是深具现实意义，因为对原因的追究直接涉及责任的认定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方向（后文第三、四节将对这两个问题分别展开讨论）。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系统风险是〇八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次危机表征了资本主义的败绩，代价惨重，教训深刻。与此观点相反，有一种较为常见的争辩意见，可以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阿斯墨格鲁的这段论述为代表：“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念可能瓦解，这一风险不应忽视。毕竟，过去二十年是资本主义高歌猛进欢呼胜利的二十年。由此很多人自然会地认为，辉煌时代之后的苦境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实际上，我们正在遭遇的并非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本身的失败，而是不受规制的市场的失败——特别是不受规制的金融部门和不受规制的风险管理。”³² 但问题是，世界上存在着“不受规制的市场”吗？闯下弥天大祸的华尔街是“不受规制”的吗？我们将在第四节重新回到这个问题加以细致的辩驳。

三、经济危机的责任与经济学界的危机

就〇八经济危机而言，原因这枚硬币的背面就是责任。如果“不理性”、“贪婪”之类的论点不能成立，危机乃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固有缺陷促成，那么就得起这场经济危机的主要责任归于政府和经济学职业界。³³ 尽管左翼学者在经济学界从来不是主流，但这次他们却

他们或许只是命名——而是对人类或动物的某种本能的描述，其生物学版本是进化论，其哲学版本是功利主义。科斯上述观点的悖谬是，他一方面不能接受把人降格为动物的理性选择与效用最大化经济学范式，另一方面又把揭秘人类行为的最终发言权交给了社会生物学家。参阅拙文《法律经济学：英美法系的理论、实践与影响》，待刊稿。

³¹ 参见 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 of Jurisprud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54.

³² Daron Acemoglu, “The Crisis of 2008: Lessons for and from Economics,” in *What Caused the Financial Crisis*, *supra* note [8], pp. 260-261.

³³ 关于为什么不谴责华尔街那些“坏蛋”，波斯纳有一段生动的解释：“有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对美联储和经济学职业界太过挑剔，同时又对金融界人士太过宽容——这看起来可能与我的下述主张相矛盾，即认为这场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但是，尽管金融人士对这场经济萧条负有主要责任，我却并不认为可以为此而责难他们——意指道德谴责——就像人们不能责难狮子吃掉斑马一样。资本主义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商人会冒那些能增进其经济利益的风险（大多数时候是在法律的限度内）；单个的商人因银行业的不稳定而担忧他的决策以及他的竞争者的决策可能会引发经济萧条，这不比一头狮子因

炮火猛烈——相应“挨板子”最厉害的就是美联储及其与〇八危机直接相关的两任主席格林斯潘和伯南克。³⁴ 尽管美联储掌握着巨大的经济权力，尽管政府内外的很多经济学家声名显赫，其经济学事业繁荣昌盛，但他们对过度的金融投机交易疏于监管和警示，在泡沫经济日趋膨胀的过程中疏于宏观调控，在危机爆发之后因缺乏应对准备而显得捉襟见肘步履蹒跚，无力遏制经济颓势，最终使经济深陷泥潭。³⁵ 这一切构成了政府和经济学界难以推卸的责任。³⁶ 而且，鉴于“专家治国”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个无法更改的既成事实——且不论它在政治上是否正确，我们这里所谈的经济危机的责任，归根结底，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一言以蔽之，被很多人视为“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³⁷ 在〇八经济危机中，跟它所信奉的资本主义一起，遭遇了一场重大失败：“在所有被戳破的经济泡沫中，几乎没有有什么能比经济学名声自身的破裂更加绚丽壮观了。”³⁸ 是否言过其实？我们可以看看经济学家们自己怎么说——

“当被问及‘您能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罗伯特·索洛，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只是摇摇头，说：‘不能。我认为常规的经济学思辨无助于解释这场危机。’”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日，索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时又说：“主导着我们的精英大学、很多中央银行和有权势的决策机构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似乎对[这场经济危机]完全哑口无言。它不但提供不了指引和洞见，而且真是说不出任何有用的东西……它已经失败了，而且注定失败。”³⁹ 伯克利加州大学著名经济史学家艾臣格林则说：“[〇八]危机使我们先前自认为掌握

担心狮子吃斑马的速度超过斑马繁殖的速度而放生一匹斑马更有意义。”他提醒人们不要弄错批评的对象：“建立预防由高风险贷款引发的经济崩溃的防护措施之责任应该属于政府。”同前注[7]，第191—192页。

³⁴ 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对经济危机的阐述，包括辩解，请看 Alan Greenspan, “The Fed Didn’t Cause the Housing Bubbl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1, 2009, p. A15; “We Need a Better Cushion against Risk,” *Financial Times*, March 27, 2009, p. 11; “Show Us the Way to Recovery,” *Financial Times*, March 30, 2009, p. 11; “Fear Undermines America’s Recovery,”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7, 2010, p. 11. Ben S. Bernanke, “The Crisis and the Policy Response,” Speech at the Stamp Lectu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January 13, 2009,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bernanke20090113a.htm>;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after the Crisis: The Role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peech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54th Economic Conference, October 23, 2009,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bernanke20091023a.htm>. 关于美联储在这场经济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参见 Frederic S. Mishkin,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24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495-508 (2009); Stephen G. Cecchetti, “Crisis and Responses: The Federal Reserv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23:1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1-75 (2009).

³⁵ 参见，例如 Raghuram G. Rajan, *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08-117; Paul Krugman, “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6, 2009, p. MM36.

³⁶ 斯蒂格利茨的批评：“格林斯潘努力要把他的低利率政策所应承担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归咎于中国储蓄率太高。但格林斯潘的这一辩解完全没有说服力。即便中国愿意以相对低的利率贷款给美国，美联储也完全可以，至少就短期来说，提高利率。事实上，美联储在二〇〇〇年代中期就曾经这么干过，由此——恰如预期地——抑制了房地产泡沫。” Joseph E. Stiglitz, “The Anatomy of a Murder: Who Killed America’s Economy?” in *What Caused the Financial Crisis*, *supra* note [8], p. 144.

³⁷ 参见，例如 Uskali Mäki, “The Dismal Quee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Uskali Mäki ed., *Fact and Fiction in Economics: Models, Real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32; Stavros Ioannides & Klaus Nielsen, “Econom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Synergies and Trade-offs,” in Stavros Ioannides & Klaus Nielsen eds., *Econom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Boundaries,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7, pp. 1-27.

³⁸ “What Went Wrong with Economics,” *Economist*, July 18, 2009, p. 11.

³⁹ 分别见 SPIEGEL Staff, “Is 2009 the New 1929?: Current Crisis Shows Uncanny Parallels to Great Depression: Part 5: Underestimating the Crash,” *SPIEGEL Online*, April 29, 2009,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0,1518,621979-5,00.html>; Robert Solow, “Building a Science of Economics for the Real World,” http://science.house.gov/sites/repUBLICans.science.house.gov/files/documents/hearings/072010_Solow.pdf. 索洛此

的大部分经济学知识都陷入怀疑之中。我们曾认为货币政策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我们曾认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改变将通货膨胀维系在了低水平的稳定状态，故而一九八五年以前的经济波动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取而代之的是‘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这样一个雅号。我们曾认为，金融机构和市场已经建立起了自我规制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投资者放任自流，如果不是完全任其为所欲为的话。最重要的是，我们曾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预防曾在一九二九年沉重打击了全世界的那种金融灾难的知识。可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过去认为正确的很多东西其实是错误的。”⁴⁰ 针对以上两位杰出的经济学行内人的自述，作为读者，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只有赞赏其诚实和坦率。

正如伦敦大学经济学家陶普罗斯基所批评的，“这场金融危机从拥有最‘高级’的金融体系的国家爆发并波及世界，经济理论尚没能对此做出适当的阐释。也就是说，种种经济学理论没能——尽管应该——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应对这场危机提供帮助，也很少有经济理论家能够阐释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及其隐含的意蕴。除了那些令我们在应对这样一场危机中遭遇了炫目失败的见解，他们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别无其他。”⁴¹ 于是，人们就不会感到奇怪，“关于如何遏制经济下滑、加速复苏、预防[衰退出现]反复的具体措施，[经济学界]根本不存在专业共识。经济学职业界无法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情竟然可能发生，也未曾认真考虑一旦危机真的发生应当如何应对。”⁴²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日，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讲座”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断言，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学“往好里说是蔚为壮观的无用，往坏里说是实实在在地有害”，⁴³ 我们生活在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一个已然将来之不易的知识淡忘的时代”。⁴⁴ 与克鲁格曼的观点类似，伦敦经济学院的布特教授认为，过去三十年间美国英国大学里的宏观经济学教育属于“浪费时间，代价沉重”。⁴⁵

经济学界，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家，在这场经济危机中所遭遇的失败有大量具体的例证。在危机爆发之前，他们认为，一九三〇年代大萧条结束之后，“萧条”已经成为永远不会再来的历史陈迹，其智识上的自负在下述例证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罗伯特·卢卡斯，芝加哥大学杰出经济学教授，一九九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美国经济学会二〇〇三年年会上发表的会长讲话中说：“作为独立领域的宏观经济学诞生于一九四〇年代，它是人们对经济大萧条的智识回应的一个组成部分。‘宏观经济学’一语那时候是指人们期待可以用来防止此种经济灾难重演的知识与技能。我的演讲主题是，这种原初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成功：其中心问题，即经济萧条的预防，已经解决，在实践上已不再有任何疑难；而且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几十年前就解决了。”⁴⁶ 这话在今天听来是多么反讽啊！除了学院经济

前曾反对那种认为经济学变得“形式主义、抽象、忽视真实世界”的批评，并辩护道：“现代建模者绝非不切实际，他们反倒是沉迷于数据了。” Solow, “How Did Economics Get That Way and What Way Did It Get?,” 126:1 *Daedalus* 39, 57 (1997).

⁴⁰ Barry Eichengreen, “The Last Temptation of Risk,” *National Interest*, May/June, 2009, p. 8. 本文直接引语中的着重号均为引者所加，以下不一一注明。

⁴¹ Jan Toporowski, “Excess Debt and Asset Deflation,” in Steven Kates ed., *Macroeconomic Theory and its Failings: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 p. 221.

⁴² Richard A. Posner, “How I Became a Keynesian,” *New Republic*, September 23, 2009, p. 35.

⁴³ “The Other-worldly Philosophers,” *Economist*, July 18, 2009, p. 65.

⁴⁴ Krugman, *supra* note [35].

⁴⁵ *Supra* note [43], p. 65.

⁴⁶ Robert E. Lucas, Jr., “Macroeconomic Priorities,” 93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 1 (2003).

学家，政府经济学家也有炫目的失败例证，比如说美联储主席。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八日，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个表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会议上，伯南克说：“让我借美联储官方代表这一身份之便讲这样几句话来结束发言：关于经济大萧条，我要跟米尔顿和安娜说，你们是对的，我们〔美联储〕对那场大萧条负有责任。我们对此非常抱歉。不过幸亏有了你们，我们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⁴⁷ 大约六年之后，错误重演。历史反复证明的一点是，历史给人们的实际教益少之又少。重蹈覆辙乃历史常态。⁴⁸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道，为什么没有人在当年九月之前注意到信贷危机的迫近？⁴⁹ 十位经济学家在回答女王该问题的一封信中写道：“〔危机的〕部分责任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主流的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身上。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华西里·莱昂惕夫，已经对近年来经济学变成了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与真实世界的制度和实践相隔绝的状况提出了批评。”⁵⁰ 过去十余年来，经济学的学术潮流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有相当多的宏观经济学家和金融经济学家沉溺于某种由数学工具构造的虚拟世界。很多时候，这个虚拟的经济世界与需要学者们研究的真实问题之间的关联微乎其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们背叛了他们所信奉的“理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学术潮流或方法论时尚变化了的时候，只有“识时务”者方能拿学位、发表、得到铁饭碗。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学者布劳格所描述的：

西方世界的经济学由美国主导，而美国的经济学由每年新毕业的、要在美国的三千所高等学府研究机构找工作的四百至五百名经济学博士主导；要获得一份工作或者在得到工作之后谋求晋升，就得在实行评审制的大约三百种英语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且最好是那十来种权威的评审制杂志。不论我们如何反对针对经济现象所做的技术导向的数学建模型研究，不变的事实是，尽管习得此种数理技能的初始投资成本较高，然而一旦学会了这个套路，就很容易产出论文，而且产出的论文也比那种文字图形类论文更容易评价和评审。在三百种半年刊或季刊上，每年发表大约四千至五千篇经济学论文，这些论文经过美国名牌大学的大约三百位学者的评审，这些学者的学生会成为下一代论文评审人，下一代的论文自然也就和这一代学者所写作和发表的论文非常相似。换句话说，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创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具有内生动力的职业化机器（treadmill），其持续的动力来自于在有名望的刊物上发表论文以求在有名望的机构谋得职位，这种机构所提供的年薪大约是地处学术

⁴⁷ *Remarks by Governor Ben S. Bernanke*,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2/20021108/default.htm>. 弗里德曼和安娜·斯瓦茨合著有两部经典的宏观经济学著作：*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1963）和 *Great Contraction, 1929-1933*（1963）。

⁴⁸ “我问〔理查德·波斯纳〕，他认为经济学家在过去两年间吸取了什么样的教训，‘嗯，他们有可能什么教训也没吸取’，他缓慢答道，‘因为在学术市场中，市场本身的矫正效应显露得十分缓慢。教授们都有铁饭碗（tenure）。他们在教育流水线上有大量等着拿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他们的学术技能不但是已然掌握的，而且是得心应手的。要驱动他们改变其久已习惯的行为方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John Cassidy, “After the Blowup,” *New Yorker*, January 11, 2010, p. 29.

⁴⁹ 参见 Tim Besley & Peter Hennessy, “Letter to the Queen (July 22, 2009),” <http://media.ft.com/cms/3e3b6ca8-7a08-11de-b86f-00144feabdc0.pdf>

⁵⁰ Sheila C. Dow *et al.*, “Letter to the Queen (August 10, 2009),” 27:3 *Homo Oeconomicus* 334, 334-335 (2010).

‘西伯利亚’的机构的二倍。要想扭转这种局面，就是要叫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人忽略主导经济学论文的研究时尚，去写一些不时髦的东西……⁵¹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显然不存在这种变革的可能。类似的寻求写作生产率的诱惑可能是在以写作为生的人中间广泛存在的，作家史铁生对此曾有生动描述：“这一来你中了魔了，整天都在想哪一件事可以写，哪一个人可以让你写成小说。是中魔了，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在人山人海只寻找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试剂就好了，见人就滴两滴看他是不是一篇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显影液就好了，把它泼满全世界看看都是哪儿有小说，中了魔了……”⁵² 模型正是数理建模型经济学分析中的“试剂”或“显影液”，经济学写作者把它往数据上一泼，一篇严整的论文就浮现出来，来自这个世界的一手、二手或 N 手数据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一个掌握建模本领的写作者只要有少数趁手的模型，就可以产出大量合格论文。⁵³ 莱昂惕夫曾对此批评道：“年复一年，经济学理论家们以每年数十种的速度持续生产着数学模型，并非常精细地考察其形式特征；计量经济学家们把所有可能的代数函数形态套到本质上无差别的数据组上，却未能以任何可感知的方式推进人们对真实经济系统的结构和运作的系统性理解。”⁵⁴ 科斯也曾对此类研究给予犀利的讥讽：“只要你对数据的拷打足够充分，它总会供认不讳的（nature will always confess）……库恩对此有更为隽永的表达，使这个过程显露出了一些魅惑的意味：‘只要科学研究者用其理论预设去测度自然，自然女神总会做出回应。’”⁵⁵ 科斯历来反对那种只“存在于经济学家的头脑中而非人世间”的经济学，也就是他所谓的“黑板经济学”。⁵⁶ 典型的“黑板经济学”症状是：“当经济学家发现他们无力分析现实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就构造出一个自己有能力处理的想象的世界。”⁵⁷ 科斯在二十多年前做出的这一诊断可以恰如其分地应用到很多晚近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上，尤其是其滥用数学的方法论时尚。物理世界的结构和系统当然可以甚至必须用数学语言来描摹，可是，就人类社会系统和人类自身行为而言，尽管数学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然而却常常不敷足用。固然，数学模型可以消除特定语境下的无关或弱相关变量，简化分析，使无限复杂的世界变成可以用学术语言描述、解释的对象（如博弈论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但另一方面，数学建模本身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常有过于简化之虞，因为人类社会系统和思维系统以极度复杂而且不能确证的方式塑造、干涉着每一个人的行为，牵涉的变量无穷

⁵¹ Mark Blaug, “Ugly Currents in Modern Economics,” in *Fact and Fiction in Economics: Models, Real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supra* note [37], pp. 44-45.

⁵² 史铁生：《我与地坛》，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7—18 页。

⁵³ 当然，类似的学术方法论和知识生产问题也存在于经济学之外的很多其他社会科学学科。

⁵⁴ Wassily Leontief, “Academic Economics,” 217 *Science* 107 (1982).

⁵⁵ Ronald H. Coase, “How Should Economists Choose?,”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27. (省略了脚注。附带说明，因“nature”和“confess”二字所具有的宗教意涵，笔者无力在此精微地翻译“nature will always confess”一语。)此外，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过度使用，科斯还曾挖苦说：“我年轻时曾听人说，太蠢以至于不能说的东西可以唱。现代经济学则把那些东西放到了数学里。”Coase, “Notes on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in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185.

⁵⁶ Ronald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8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3, 714 (1992). 科斯认为这种方法可以追溯至曾一度影响很大的罗宾逊夫人 (Joan Robinson) 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 一书，罗宾逊的方法也曾影响过年轻的科斯：“这种理论工具有一个长处，你无需去发现发生在真实世界中的任何事情，仅凭在黑板上画满图表公式就可以把课程讲完。”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Meaning,” 4:1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19, 22 (1988). 反讽的是，有学者提出，“黑板经济学”是交易成本最低的经济学，参见 Uskali Mäki, “Science as a Free Market: A Reflexivity Test in an Economics of Economics,” 7:4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486 (1999).

⁵⁷ Coase, *ibid.*, p. 24.

无尽,包括大量未知变量。这样一来,对人类行为的数学建模在使用数量极为有限的变量的同时必然要忽略绝大部分其他变量,并需要假定这种——与自然科学建模相比——非同寻常的忽略对模型本身的有效性没有根本性影响。说到底,这是一种学术游戏。尽管所有的学术最终或多或少都有游戏的意味,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无需对此类研究的学术有效性和社会效用保持警醒的理由。这个道理,凯恩斯在经济大萧条后不久出版的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早就讲过:“人的决策会对未来产生影响,不论是个人的决策还是政治的或经济的决策,都无法依赖严格的数学上的期望值,因为进行此种计算的基础并不存在;是我们内在的行为冲动推动车轮向前,我们理性的自我在可能实现的最好选项之间权衡抉择,在能计算的场合计算,但还是常常退回到我们基于随想、情感或机缘的心理动因。”⁵⁸

遗憾的是,科斯、凯恩斯、库恩这些前辈学者的批评与忠告⁵⁹终究不敌晚近一代经济学研究中那些危险而且有害的方法论时尚,学术游戏如火如荼,至今不衰。⁶⁰可是繁荣的表象无法掩盖下述事实:过去数十年间经济学家们所做的相当大一部分工作事实上是徒劳无功的,当下的经济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人们目睹的现实是: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界对阐释和应对危机殊少理论准备,拿不出什么真正有用的分析模型或其他理论工具。在一份题为《金融危机与经济学职业界的系统性失败》的报告中,七位欧洲经济学家做出了这样的(自我?)批评:“随着危机的加深,经济学家束手无策,只能放弃他们的标准理论模型,提出一些含混的常识性的救济措施。常识性意见,尽管有用,却只是基础理论模型的一种粗劣替代。把现有的理论模型置之一边,只是说‘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措施’,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处理这种‘非常时期’的模型。”⁶¹绝大部分经济学界人士,不论是任职于政府还是学术机构,都令社会公众深感失望。上述七位学者的报告对经济学界在其理论研究和学术责任上的不称职表现有一个简明的概括:

我们认为经济学已经陷入了一种平庸(suboptimal)均衡,其大量的研究没有回应最迫切的社会需求。经济学家之间彼此自我强化的反馈效应可能已经导致一种没有坚实方法论基础的理论范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导,该范式的经验表现至少乏善可陈。经济学职业界自以为弄明白了并因此打发掉了现代经济学中最主要的问题,而不探讨其流行的理论模型的局限或预设,就此而言,他们对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负有责任。他们没有尽职地提供为社会所需的有关经济与市场运行的洞见,而且他们不愿强调其分析所存在的局限性。经济学职业界甚至无法以某种假说的方式来说明

⁵⁸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162-163.

⁵⁹ 类似的批评还有不少,如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朗纳·弗里施:“这些假定常常是为了数学处理的方便,而不是为了贴近具体的事实。”Ragnar Frisch, “Econometrics in the World Today,” in W. A. Eltis et al. eds., *Induction, Growth, and Trade: Essays in Honour of Sir Roy Harrod*,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70, p. 162.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沃斯维克:“现如今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充斥着各个分支领域,这些理论与具体的事实毫无关系,与纯粹的数学几乎没有区别。”G. D. N. Worswick, “Is Progress in Economic Science Possible?,” 82 *Economic Journal* 73, 78 (1972). 在批评美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现实脱节的时候,两位专长于经济学思想史的经济学家称,“在最严重的时候,当前[经济学研究]‘高度理论化’的不切实际程度,只有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才能与之媲美。”Robert Heilbroner & William Milberg, *The Crisis of Vision in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 限于篇幅,不列举更多。

⁶⁰ 从本文所持的批判视角来观察,用以换取经济学职业界人士不菲的个人收益(咨询薪酬、终身教职等)的成本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社会成本,而且可能是像经济萧条这样沉重的社会成本。这里所涉及的学术职业责任和伦理问题,超越了本文主旨,此处无法展开论述。

⁶¹ *Supra* note [18], p. 263.

当前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无力提供标准的宏观模型和金融模型来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任何解说,我们认为,这样的事实构成了一个有力的理由,去对这些学术领域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重构(reorientation),并反思其基本的理论预设。⁶²

对经济学界的批评已经连篇累牍,那么有没有辩护和辩解呢?当然也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辩解来自曾任小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竞选顾问的哈佛知名宏观经济学教授曼昆。作为著名经济学教科书作者,曼昆在一篇探讨经济危机对大学经济学原理课程内容影响的文章中写道:“可以说,[〇八经济]危机使大多数经济学家感到难堪。在某些人看来,预测上的失败是[经济学]职业界的罪状。但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至少在下述意义上,当前的经济颓势并不稀奇(typical):大多数经济衰退都会让人们感到意外。经济活动中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但这并不是[让经济学界]感到难堪的理由。医学专家也不能预测猪流感之类疾病的突发,而且他们甚至不能确定疾病爆发之后的传播途径,有些事就是难以预测。”⁶³但这样的辩解完全没有说服力。首先,因〇八危机的爆发出乎意料,就把它归入典型的经济衰退,近乎强词夺理。前述七位欧洲经济学家的报告指出,尽管本次经济危机可以用惯常的繁荣—萧条经济周期模式来解释,但它也具备两个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征:先前的危机通常是由实体资产的过度投资造成的,而本次危机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型虚拟金融产品的过度发展造成的;另一方面,本次危机也可以说是由全球金融体系日趋紧密的高度关联性造成的。⁶⁴关联性的积极一面表现为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系的建立,其消极的一面则是金融系统风险的国际化,正是这种风险的国际化使爆发于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发展成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其次,曼昆论点所存在的更大问题是,经济学界的失败(及其难堪)绝不仅仅因为他们没能“预测”出这场危机,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误导公众的陈述和基本上无用的工作直接地、间接地恶化了经济危机;因为个人、企业以及政府的很多经济决策都依赖甚至严重依赖经济学家的意见(这是前述“专家治国”的意涵所在)。⁶⁵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市场中的博弈者和规制者对自由市场和金融系统中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⁶⁶应会保持更多的警觉,因此就可能避免这场危机或使其程度大大减轻。然而,他们实际的所作所为是:“经济学家们给政府官员、商人和社会公众打包票说一切都很好——他们知道如何预防经济萧条;萧条绝不会重演。但当萧条袭来时,他们又似乎若无其事地说,他们并不真的知道如何预防萧条,也不真的知道能如何引领我们走出萧条。他们过去不过是假装自己理解萧条——萧条本身的复杂程度超出了经济学家的建模能力。”⁶⁷由此可见,经济学界的责任主要不在于——曼昆所论辩的——在经济危机预测上的无所作为;而在于他们的某些所作所为:误导商界、政府和公众。⁶⁸

⁶² *Id.*, p. 278.

⁶³ N. Gregory Mankiw, “That Freshman Course Won’t Be Quite the Same,” *New York Times*, May 24, 2009, p. BU5.

⁶⁴ *Supra* note [18], p. 277.

⁶⁵ “很少有经济学家发觉到这场危机的迫近,但这一预测上的失败是经济学领域存在的诸问题中最次要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学职业界对真实存在的市场经济灾难性失灵之可能性的视而不见。”

Krugman, *supra* note [35].

⁶⁶ 参见前注[7],第51页; Posner, *supra* note [12], p. 289.

⁶⁷ Posner, *supra* note [12], pp. 330-331.

⁶⁸ 一个相关的戏剧性事件: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日,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课堂中有近七十位学生中途退席出走,表达对该课程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抗议。参与此次行动的学生在给曼昆的公开信中,暗示了这种经济学教育是促成〇八经济危机的部分原因。Concerned Students of Economics 10, “An Open Letter to Greg Mankiw,” *Harvard Political Review*, Nov. 2, 2011,

除了学院和政府经济学家,受雇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私营部门金融理论家堪称催生经济泡沫的幕后推手,并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他因素合力促成了〇八危机。过去十余年间,金融理论家创生了很多新型金融产品,其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赚取更多利润。新型金融产品在客观上加强了资本的流动性,促进了经济繁荣,尽管在某些领域某种程度上是非理性的繁荣。⁶⁹ 衍生金融工具等新型金融产品的外部性最终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及其政治经济代理人在攫取了巨额经济利益之后,信贷和资产泡沫破灭所造成的财富蒸发、通货紧缩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不良连锁反应所构成的沉重社会成本则由全社会共同承担。

经济学,或至少是作为其重要分支的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理论,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恐怕需要一次严肃的重整。其实,早在二十年前,诺贝尔奖得主莱昂惕夫就曾提出警告:“‘寒碜的表现……经济学家们展示得最为清楚的就是该职业群体在智识上的落后程度。’首屈一指的经济周刊社论……的这一评论实际上说的是,‘皇帝没有穿衣服。’但是,行进在当代美国学术经济学精巧而严肃的游行队伍中的人们对此似乎没有觉察,那些觉察到的人又不敢说出真相。”⁷⁰ 皇帝到底有没有穿衣服,现在应该已经不是问题了。真相即使迟到,仍然有必要说出。经济学家,作为社会科学家,需要更好地控制其意识形态前见,⁷¹ 抵制不那么正当的职业经济利益的诱惑。⁷² 这些前见跟诱惑对经济科学和经济政策会造成特别大的伤害,而经济科学跟经济政策又以或好或坏的方式时时刻刻塑造、改变着我们赖以生活的真实世界。

悖论是,就今天的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和经济学职业界来说,套用马克思的名言,上述“批判的武器”事实上不可能导致“武器的批判”。⁷³ 其原因概括来说包括内外两个方面。从经济学界内部着眼,可以说,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及其从业者,至少就其中地位煊赫的那部分而言,是参与塑造和操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力量。作为那体制的主人或者高级雇员,他们几乎不可能超越自身利益而将批判的矛头转向自身,说到底,也就是不大可能以科学而非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学家的失败二者的终极原因是同一的。另一方面,从经济学及其职业界外部的宏观视角来看,以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为经济表征的资本主义,作为“终结”了“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唯一出路,已经成功消灭了其他的基础性

<http://hpronline.org/campus/an-open-letter-to-greg-mankiw/>; 也参见 Jose A. DelReal, “Students Walk Out of Ec 10 in Solidarity with ‘Occupy,’” *Harvard Crimson*, Nov. 2, 2011,

<http://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11/11/2/mankiw-walkout-economics-10/>; Melanie Jones, “Occupy Wall St. at Harvard: Students Demand Prof. Change Cours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Nov. 7, 2011,

<http://www.ibtimes.com/articles/244991/20111107/occupy-wall-street-demand-harvard-mankiw-students.htm>.

⁶⁹ 参见 Robert J. Shiller, *Irrational Exuberance*, 2ed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希勒是为数很少的预测到这场经济危机的经济学家之一。

⁷⁰ Wassily Leontief, “Academic Economics,” 217 *Science* 104 (1982).

⁷¹ “一般来说,只要你知道一个经济学家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你就能知道他对 7870 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是赞成还是反对或者他更担忧的是失业还是通货膨胀。一门成熟的科学不会是这样的。” Posner, *supra* note [12], p. 306.

⁷² 关于利益对于知识的扭曲,摘得二〇一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曾有如下观察:“……经济学家通常依据一些可被正当化的主张来考虑很多理论和模型,进而匹配数据并预测政策效果。我们[经济学家]必须提出建议,或对替代性政策之后果的不确定性做出精确描述,尽管不存在一个规范获得接受的理论。非经济学家经常基于其自身的利益考量而偏好此政策或彼政策,或偏好那种具有伪装的确定性的专家意见,基于这个原因,就存在着一种激励,促使经济学家变成某些理论的坚定拥护者,而不是知识状态的冷静评估者。” Christopher A. Sims, “Macroeconomics and Methodology,” 10:1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5, 107 (1996).

⁷³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 页。

制度替代与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前面的道理也可以反过来讲，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家——作为一种世俗职业的从业者——无力超越其制度宿命，那么他们的失败就可能在终极意义上超越伦理评判。但终极原因和终极意义是上帝的事业；对经济学的批判，就像经济学本身一样，是世俗的事业，即我们的事业。放弃此种批判就会走向那种陷入了“二律背反”的经济学神话——“自发秩序”。⁷⁴

四、政府与市场之争：经济危机的意识形态影响

清算责任为的是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重整。可是，如上所述，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并不仅仅是科学问题，而是广泛牵涉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纷争。既与政府责任又与经济学界责任相关的是一个老套但依然重要的问题，即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值得结合中国语境和经济危机背景加以辨析。中国学术界有主流经济学家近年来重提了这个问题，其立场与保守主义在西方的衰落景象相映成趣：他们主张应该借助这场经济危机来“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⁷⁵ 其实，在确认政府尤其是中央银行对经济萧条所负有的责任上，推崇奥地利学派的当代中国保守派和改信凯恩斯主义的波斯纳立场接近。但是，在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和政府救市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上，二者存在深刻差异。中国的保守派正确地提出了如下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换一句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导致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⁷⁶ 但是保守派对该问题的回答却令人费解。他们援引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来反对凯恩斯的理论（暂且不论他们对两派理论的概括是否准确），认为是政府对经济的监管政策造成了经济萧条，政府的救市措施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萧条。⁷⁷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具体来说，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的错误”，而非放松金融管制，才是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因为错误的政策扭曲了市场信号，误导了市场参与者。由此，他们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到政府身上。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即使在语义上行得通，在逻辑上也会碰壁。波斯纳有一个关于污染的类比很能说明问题：“假如政府拒绝针对污染采取任何措施，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就可以把这种拒绝称为污染的‘原因’之一，但是一种更富启发意义的表述是，政府没有对由工业引发的污染采取任何措施。”（第83页）你可以看到，就像政府没有造成污染一样，政府同样也不是经济萧条的直接或者根本原因。而且，“货币政策的错误”之类的判断折射出的是一种貌似天真的本质主义：何种货币政策才是“正确”的？敢问经济学家们——不论是学院经济学家还是政府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统一过么？

回到政府造成经济萧条这个论点本身，其论证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即使不存在政府对经济的“错误”调控，也很可能会出现一场经济萧条，因为即使美联储自二〇〇〇年代早期以来没有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巨额的海外资本涌入美国（众所周知，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中国政府）也会使其利率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这同时解释了个人储蓄率的下降与过度借贷消费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何以能够共生）⁷⁸；而且低利息率并非经

⁷⁴ 参见后注 99、100 及其对应的正文。

⁷⁵ 张维迎：“危机中的选择”，《经济观察报》2009年2月16日。

⁷⁶ 同上。

⁷⁷ 除前注引文外，也参见张维迎：“理解经济危机”，载《读书》2009年第5期。

⁷⁸ 外国政府供给美国消费者借贷所需资本。参见前注[7]，第33页。

济萧条的唯一原因，尽管是主要原因。第二，在金融监管活动中，政府和私人部分之间的界限模糊了。换句话说，政府——尤其是小布什政府——的经济官员和金融市场中的私有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但却不完全为公众所知晓或者理解的联系（我们对此不必触景生情）。波斯纳的观察一针见血：“实际上，政府把挽救由华尔街造成的经济危机的权力又授予了华尔街。”

（第 162 页）听起来像是笑话，但却是事实，而且是必然的事实：要应对由金融风暴引发的深刻经济危机，你难道能信任政客胜过信任金融专家么！？这是一个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专家治国不可避免，证明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的危机，而不应将根源归结为政府的错误或失败。尽管波斯纳不会把自己当成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这样的分析（经济危机系资本主义体制内在经济风险所触发的系统性危机）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不难接轨。在这个意义上，斯蒂格利茨的左翼批判不过是同一个故事的另一种讲法：“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华盛顿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政府体制：华尔街获准指定服务其一己私利的游戏规则，结果他们制定出来的规则置全球经济于危险的境地。然后，当报应之日来临之际，华盛顿却转向华尔街人士及其密友，让他们来掌控经济复苏——其方式就是向华尔街注资，那金钱的数量超过发展中国家最腐败者的最狂野的想象。他们眼中的美国式腐败或许比别处的更为老道，但邪恶却无二致。”⁷⁹

像保守派那样把危机归咎于政府，实有人为割裂政府和市场之嫌，在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例如，他们认为：“所谓市场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批评者的臆想和由此导致的政府干预的结果。特别是由于政府或某种强权的不恰当干预，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使市场经济表现为病态的市场经济，这时候，人们往往以为这是市场本身的毛病。”“即使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这样一位因对信息经济学作出重要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也很不到位，误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当作市场本身的缺陷。”⁸⁰ 有趣的是，遭到中国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批评而不自知的斯蒂格利茨是这么说的：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五日，即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塌的日子，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大概相当于柏林墙倒塌之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问题在雷曼倾颓之前即众所周知，但在此之后，已无人能真正为之辩护。随着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倒闭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困局和为解困所做的混乱努力，美国胜利主义（American triumphalism）的时代已经终结。与之一并终结的是关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论争。今天，只有上当受骗者（包括很多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但在发展中国家这种人少得多）才会主张市场总能自我纠错、社会仅靠市场参与者的自利行为就能确保一切都会正当而且稳妥的运行——更不要说还让所有人都能获益了。”⁸¹ 知识之争的意识形态本质于此显露无遗。众所周知，政府和市场之间并非截然排斥的对立关系。政府是市场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现代经济中不存在没有政府监管和调控的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政府的政策造成了危机，那么在逻辑上就可以推论，任何经济现象，不论好坏，都是政府造成的——这等于什么也没说。由此凸显了浅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修辞本性：什么是“干预”？“干预”和规制的区别是什么？是不是所有的“干预”都是不适当的？如果不是，适当与否的标准是什么？谁有权威来确定这个标准？更具体地说，没有政府可能有现

⁷⁹ Stiglitz, *supra* note [8], pp. 225-226.

⁸⁰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 页。此书中作者以上帝般口吻所作的断言俯拾皆是，比如：“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第 1 页）“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我们为什么要出钱养活这么多经济学家？……答案是……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第 10 页）这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它所推崇的奥地利学派大师米塞斯、哈耶克相比，智识上的退化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在把市场经济推上圣坛的同时，涉嫌侮辱了经济学家的智商（如果没有贬低其人格的话）。

⁸¹ Stiglitz, *supra* note [8], p. 219.

代银行和证券市场吗？政府通过银行法、证券法及相关的宏观微观经济政策来管理银行和证券市场设立与运行，是不是“干预”经济？就每一项具体的金融立法和政策而言，“干预”与否的标准和界限是什么？这些恐怕都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无法回避的棘手问题。不妨用一个最浅白且常规的例子来说明：某一社会的宏观经济状态（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应不应该对利息率做出调整？如果需要调整，是应该升高还是降低？如果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的选择存在分歧——这简直是一定的——应该怎么办？中央银行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才算没有“不恰当干预”？才算没有“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是不是废除了中央银行才能从根本上捍卫自由市场经济？如果中央银行可以废除，是不是还有更多政府管理机构可以废除？是不是所有可能干预经济运行的政府机构都应该废除？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界线到底在哪？可能划出这样一条清晰的界线吗？⁸²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似乎不明白，自由市场中理性的私人 and 私有企业的合法经营行为在特定条件下同样可能促发经济灾难。⁸³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及其古怪的意识形态不但在知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还例证了下述结论：修辞的私人成本很低（而且通常会有被私人收益抵消之后的大量盈余），但，就像〇八经济危机展示给世人的，作为其后果的社会成本却可能极为高昂。⁸⁴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波斯纳对保守主义者的批评不动声色却力道十足：“保守主义者不同意，这场经济危机意味着市场在整体经济灾难的成本内部化上的失败。他们主张，原因在政府……现在，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追求小政府的保守主义者，至少是其中掌权的那部分，满足于这些[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的]政策……直到需要为政府找到一只替罪羊来解释这场经济萧条为止。”（第 82 页）与此相关的一点是，在讨论政府对危机的责任和应对措施的时候，还必须考虑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即，经济萧条既是经济事件，也是政治事件；它既会造成经济危害，也会在政治上带来不良甚至灾难性后果（历史上的著名例证是一九三〇年代经济大萧条与纳粹攫取德国政权及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联）。因

⁸² 废除中央银行，是提出“无政府资本主义”（anarcho-capitalism）学说的美国经济学家莫瑞·罗斯巴德（1926-1995）的主张。参见 Murray N. Rothbard, *The Mystery of Banking*, 2nd ed., Alabama,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8, p. 261. 而罗斯巴德正是张维迎等中国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的学术偶像（参见张维迎：《理解经济危机》，《读书》，2009 年第 5 期）。无政府主义，其实在张维迎著作的字里行间已经呼之欲出了。当然，我并不想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洪水猛兽，不过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便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常与凯恩斯并称的二十世纪最显赫的保守主义经济学“教主”，也还是从“无政府主义”上后撤了半步，试图让中央银行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干预”经济，而不是将“干预”本身彻底消灭。参见 Brian Doherty, “Best of Both Worlds,” 27:2 *Reason* 32 (1995). 走向无政府主义的极右翼经济学当然有其策略或姿态上的考虑，但这一现象（在中国）的根源最终大约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生成的政治张力。这种经济学立场的政治意蕴笔者在此不便评价，但可以说的的是，如果上述“策略”、“姿态”或“政治”层面的观察不是捕风捉影的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立场显然已经超出了经济科学的范畴，而且，如笔者在正文所论辩的，它也不能在经济学理论层面上得到有效的正当化论证。这就又把我们带回到前文所述的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前见与职业利益诱惑问题了。参见前注 71 和 72 及其对应的正文。

⁸³ “……泡沫经济中的风险行为，就个人来说，是理性的。但就集体来说，是不理性的。一个人在决定减少储蓄的时候，不会考虑他的决策对整体经济造成的微不足道的影响，但任何一位银行家在决定他银行资本机构中的资金杠杆比率时都会考虑这种影响。一个人理性地忽视其经营与消费行为的间接影响，正是政府在监管金融行为时有责任比仅仅防止欺诈、盗窃及其他侵害财产和契约权利行为——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这些就是政府职责的全部——做得更多的原因。如果没有比那更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守法的金融职业者和消费者的理性行为就可能促发经济灾难。”前注[7]，第 79 页。

⁸⁴ 关于经济学的修辞特征，参见 Arjo Klamer, “As If Economists and Their Subject Are Rational,” in John S. Nelson et al. eds., *The Rhetoric of Human Sciences: Language and Argument in Scholarship and Public Affair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pp. 163-183; Deirdre N. McCloskey,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2nd ed.,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8; 尽管我并不完全同意两位作者带有“后现代”意味的立场。

此，政府抗击经济萧条的措施在事实上不可避免地要“立足于经济上的揣度和政治上的便利之结合”（142页）。经济学家的考虑如果仅从自己的学科视角出发，就显得书生意气了。这一点对于〇八危机的分析而言其实相当重要；我们对中国很多现实问题的分析，也不应忽略经济危机的政治意涵，尽管中美两国的政治现实存在巨大差异。

经济危机的原因与责任问题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正如张维迎所说，它“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这个问题，换一种表述方式，就是要问，遭遇了一场重大失败的，到底是何种资本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类型或者模式，长久以来学者们曾有各种各样的见解，⁸⁵ 不过就有代表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讲，通常分为两种类型，即英美式资本主义和欧洲式资本主义。⁸⁶ 到底是哪一种资本主义出了问题？波斯纳的简明回答：“这场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某一种资本主义的失败（宽泛意义上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或者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相对于‘欧洲式’资本主义的‘美国式’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最忠实信徒们的失败。”（第175页）此言一出，或许语惊四座。在此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在〇八危机发生之前，波斯纳是美国学术界著名的保守派知识分子，“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因此他在这场经济危机中的学术和政治立场转向格外引人注目——在与《纽约客》杂志的访谈中，他甚至谈到，这场挑战是针对整个经济学界的，但其中首当其冲的是芝加哥大学，大概应该让“芝加哥学派”这一称谓“退休”了。⁸⁷ 公允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经济意识形态论战中都陷入了“虚幻谬误”（nirvana fallacy）⁸⁸，即拿某种现实事物跟理想化的虚幻事物相比，忽视了二者之间的不可比性。显而易见，自由市场和政府管制都不完美。信奉自由市场永不出错的神话，进而用这种神话般的市场去攻击政府规制的弊端，就是一种典型的“虚幻谬误”；反之亦然。波斯纳含蓄地承认了，在他自己的某些法律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这种“虚幻谬误”。⁸⁹ 不过，对法律经济学中此类谬误的严肃反思和检讨尚需时日，主要原因是法律经济学研究在如今的经济学职业界只占据着非常次要的位置，法学院内部的法律经济学出身仍然不够纯正（与经济学方法对法学院课程的广泛影响形成反差的事实是，迄今为止，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并传授法律经济学的法学教授们大多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而经济危机对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的影响尚没有充分显现。⁹⁰

⁸⁵ 例如，较为晚近的一个例子：William J. Baumol, Robert E. Litan, Carl J. Schramm, *Good Capitalism, Bad Capit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p. 4.

⁸⁶ 例如：Edmund S. Phelps, “Dynamic Capitalism,”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10, 2006.

⁸⁷ 参见 *supra* note [48], pp. 28, 33. 芝加哥学派昔日的煊赫只需一个简单事实便一目了然：毕业或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多达十二人：Friedrich von Hayek (1974), Milton Friedman (1979), Theodore W. Schultz (1979), George J. Stigler (1982), Merton H. Miller (1990), Ronald H. Coase (1991), Gary S. Becker (1992), Robert W. Fogel (1993), Robert E. Lucas Jr. (1995), Myron S. Scholes (1997), James J. Heckman (2000), Roger B. Myerson (2007)（括号内为获奖年份，其中 Hayek 和 Scholes 在获奖时已经离开芝大。）

⁸⁸ 参见 Harold Demsetz, “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 Another Viewpoint,” *12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 (1969).

⁸⁹ Posner, *supra* note [12], p. 332. 波斯纳的这一自我批评见于该书批评宏观经济学的那一章的最后一页的最后一个脚注。但某些批评家对这种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不买账，有学者甚至宣称波斯纳“过去四十年间的新自由主义霸权主义”（自他的第一篇法律经济学论文即一九六九年在《斯坦福法律评论》上发表的《自然垄断及其规制》起算）以及他的法律经济学研究都已经终结。*Supra* note [13], p. 329. 然而，这位英国学者同时也说：“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要以为，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使它对政府失灵的批判也被一笔勾销了。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看起来颇为显眼的制度缺陷也无力轻易地解释美国在与欧洲文明竞争中所得到的优势地位。”*Ibid.*, p. 330.

⁹⁰ 由于法律经济学归根结底就是经济学，其存在的问题也必然归结到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例如：“当[法律经济学]研究者在其建模过程中遭遇棘手的复杂情况，他们就将其标签为外部性，然后撇到一边。”

作为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的波斯纳法官在这场经济危机中的学术与政治转向既引人瞩目又具有象征意义。在《我如何变成了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一文中，波斯纳说他在经济危机中第一次阅读⁹¹了凯恩斯的名著《通论》，并赞誉该书为“杰作”，进而“断定，尽管此书已颇为古旧，它仍旧是引导我们走出这场危机的最佳指南。”⁹²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并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约三十年之久的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在这场仍未终结的经济危机中一蹶不振了。⁹³ 作为一位新加盟的凯恩斯主义者，波斯纳已经成为复兴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及其经济政策的支持者，反复申说自由市场的失败和政府监管的必要性：“有些保守主义者认为，这场经济萧条是政府不明智的政策造成的。而我认为它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就放任经济衰退演变成经济萧条来说，政府的短视、消极和失策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运行中出轨，我们需要更加一个积极和明智的政府。金融产业的反监管运动走得太远了，夸大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恢复力，即自我疗救的能力。”（第4页）尽管尚存零星异议，⁹⁴ 总的来说，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⁹⁵

综上所述，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是一种站不住脚的经济意识形态，而且，在经济学理论上也难以自圆其说。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信奉的神明亚当·斯密在当代最著名的门徒之一——的话来说，即便是对于斯密，“完全依靠市场经济和利润驱动的巨大局限性也同样是足够清楚的……事实上，包括斯密在内，早期的市场提倡者们并没有把纯市场机制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完美的运行体制，同样，他们也并不认为利润驱动就是所需的一切……当下经济危机的部分原因是市场过程的智性的过分高估，如今，人们的焦虑和对金融市场与商业整体上缺乏信心使危机进一步恶化……斯密在十

G. Edward White, “From Realism to Critical Legal Studies: A Truncated Intellectual History,” 40 *Southwestern Law Journal* 819, 840 (1986).

⁹¹ 而不是像某些学者，在提及名著的时候，在第一人称和作为宾语的名著之间所用的动词几乎总是“重读”。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们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至少对那些推定为‘博览群书’的人是如此……对于那些耻于承认自己未曾读过一本名著的人来说，动词‘读’前面的修饰语‘重’，可能意味着一种小小的虚伪。” Italo Calvino, *Why Read the Classics?*, tran. by Martin McLaughlin,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1999, p. 3.

⁹² *Supra* note [42], pp. 39, 35.

⁹³ 关于主流宏观经济学对这场危机的无能为力及凯恩斯主义的复兴，请参阅 Lance Taylor, *Maynard's Revenge: The Collapse of Free Market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关于保守主义的衰落，请参阅 David Farber, *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American Conservatism: A Short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09-256; John L. Campbell, “Neoliberalism in Crisis: Regulatory roots of the U.S. Financial Meltdown,” in Michael Lounsbury & Paul M. Hirsch eds., *Markets on Trial: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the U.S. Financial Crisis: Part B*, Bingley, UK: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2010, pp. 65-101; 前注[7]，第11章。

⁹⁴ 例如，森偏好以庇古的经济心理学分析来理解经济危机：“仅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凯恩斯可能成为我们的救星。要理解当下这场危机，有必要超越凯恩斯。”“迄今为止，市场对于政府提出的方案的回应很冷淡，这说明，对每一项政策的评估都有必要包括其对商家和消费者的心理影响，特别是在美国。” Sen, *supra* note [8].

⁹⁵ 可参见 Sebastian Dullien et al. eds., *The World Economy in Crisis - The Return of Keynesianism?*, Marburg, Germany: Metropolis Verlag, 2010; Giuseppe Fontana, “The Return of Keynesian Economics: A Contribution in the Spirit of John Cornwall's Work,” 22:4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517 (2010); Robert Skidelsky, *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 New York, NY: PublicAffairs, 2009, pp. 3-51; Paul De Grauwe, “The Return of Keynes,” 13:1 *International Finance* 157 (2010); Gary A. Dymksi, “Keynesian Approaches to Financial Crisis,” in Eckhard Hein & Engelbert Stockhammer eds., *A Modern Guide to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ie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1.

八世纪就指出了这些问题, 尽管它们被……那些忙着引用斯密鼓吹不受约束的市场的人士忽略了。”⁹⁶

就在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同一年, 一九四四年, 波兰尼出版了名作《大转型》。该书直接挑战了奥地利学派领袖米塞斯的市场自由主义, 并间接批评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⁹⁷。他指出, 自由市场是一种人为的制度产物, 而不是自生自发的社会机制, 这一观点与凯恩斯主义具有类似的精神气质:

“自由放任”绝非天然如此; 仅靠放任事物各行其道, 自由市场永远也不会形成。就拿棉花生产者来说——[一度是]最主要的自由贸易产业——他们之所以能够存在, 靠的是保护性关税、出口奖励、间接工资补贴。自由放任主义本身是由国家推行实施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见证的不仅是废除限制性规制的立法的激增, 而且是国家行政职能的极大强化, 而国家如今已经拥有了一套中央官僚系统来实现自由主义的信徒们所设定的目标。对于典型的功利主义者来说, 经济自由主义是一套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社会规划。“自由放任”并非实现某一目的的方法, 它本身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的。⁹⁸

“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是“自发秩序”理论。然而深究起来, 该理论并不能成为一个可靠的政策基础, 因为它自身至少存在两个重大问题: 其一, “自发秩序”本身没有任何规范意义和行动能力, 除非它专断地将世界划分为“自发秩序”和非“自发秩序”两部分, 并把政府变成后者的邪恶代表——事实上它就是这么做的。“自发秩序”如果不塑造出它的敌人, 就是一个空无一物的理论。换句话说, 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不是“自发秩序”的组成部分, 直到“自发秩序”对此做出规定为止——但“自发秩序”本身并不能为这种规定提供充分的正当性; 而且这种规定本身具有外部性。由该外部性可导出它的第二个问题: 人们是否可能有效而且准确地描摹即界定“自发秩序”(包括对其对立面的定义) 而对它不产生实质性的干涉?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以产权为例, 现实世界中很多产权的权能细节是不明晰的(并在这个意义上是不确定的), 在纠纷现实发生之前通常也没有明晰之必要, 因为产权界定本身需要耗费私人和社会成本。⁹⁹(请想一想复杂的财产权法律制度及其运行所需的人力、物质保障。) 产权如此, 其他社会制度何尝不是如此? 由此可见, 界定秩序本身就会干涉秩序。反驳者也许会说, “自发秩序”说的只是状态, 与状态的明晰与否无关, 言外之意是无需界定。但这对“自发秩序”理论来说恐怕不是有效辩护。“自发”的神圣“秩序”难道只是一个内涵不清的“秩序”吗? 内涵不清的“秩序”跟混沌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经过一番敲打之后, 尘埃落定, 剩下的仍旧只是修辞? “自发秩序”本身的混沌性或可戏称为社

⁹⁶ Sen, *supra* note [8].

⁹⁷ 尽管“自发秩序”一语及其思想的系统阐发是哈耶克后来做出的。参见 F. A. Hayek, “The Principles of a Liberal Social Order,” in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⁹⁸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MA: Beacon Press, 2001, p.145.

⁹⁹ 参见 Yoram Barzel,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2nd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 1.

会领域的“测不准原理”¹⁰⁰——“自发”和“秩序”成了矛盾修辞，因为二者无法兼得：如果要廓清“自发秩序”的内涵，就会干涉即破坏“自发秩序”，如果不破坏“自发秩序”的“自发”特性，人们就不可能知道那“秩序”到底是什么。

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或美国式资本主义遭遇了一次重大失败。¹⁰¹ 对这一判断，尽管在某些细节上不免还有争论，但在学术界，至少美国经济学界，已经是主流观点。即便那些坚守保守派阵地的经济学家，在原则上一般也不否认这一点。不管这失败本身，还是造成这失败的思想原因、制度原因，以及经济思想和政策实践的复杂互动过程，都会使任何对这场经济危机的学术究问最终转变为对经济学及其职业界的究问。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败绩的背后，必然是某种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和思想者的失败。

五、结语：经济与学术的双重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借助方法论的通用性和学科非政治性的优势，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及高等教育是一九八〇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最快与西方接轨并取得长足进展的社会科学领域。这是一个值得表彰的事实。通过一个微观的称谓变化就可以管窥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与变迁：大约到一九九〇年代末，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的、作为专有名词的“西方经济学”一语在学术界逐渐消失。其意涵是，一方面，经济学在中国已经不再按阶级属性区分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另一方面，即使从非政治的属性着眼，经济学的区域或国别划分也逐渐失去意义。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史表明，我们已经认同，经济学只有一种，就是曾经被称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那种经济学，此外别无其他（政治经济学如今只是经济学内部一个不重要的分支）。

可是，二〇〇八经济危机戏剧化地凸显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系统风险及该风险所招致的资本主义的一次重大失败——直至今日，包括中国、美国、欧洲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仍然跋涉在泥泞之中，未见坦途。这一失败不仅为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些主要理论和方法论敲响了警钟，而且彰显了制度背后的智识上的失败，或者说经济学知识生产实践和实践者即经济学界的失败。在这个意义上，囿于本文所述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种种弊端与局限，中国自西方成功“移植”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恐怕先天“遗传”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遭遇重大失败的某些“基因”，有必要在智识上和制度上加以检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学界曾出现过对“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的呼唤，¹⁰² 鉴于作为学科概念的“西方经济学”当时仍未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学派”的说法或多或少显露了中国经济学家与西方抗衡的学术自尊与自信。然而，有关“中国学派”的呼吁与期待似乎早已经不了了之了，其原因到底是全球化的滚滚洪流使“中国学派”变得不合时宜？还是因为“经济学”在抛弃“西方”二字之后化身为超越时空的普适知识体系？抑或因为学术和教育腐败俘虏了大部分聪明的头脑，使“中

¹⁰⁰ 学名“不确定性原理”，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于一九二七年提出，指在一个量子力学系统中，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它的动量不可被同时确定。因为对粒子位置的测定会干扰其动量，反之亦然：对粒子位置动量的测定会改变其位置。

¹⁰¹ 参见，例如 Anthony Faiola, “The End of American Capitalism?”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0, 2008, p. A1; John F. Burns & Landon Thomas Jr., “Anglo-American Capitalism on Trial,” *New York Times Week in Review*, March 29, 2009, p. WK1.

¹⁰² 例如，盛洪：“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载《中国经济学 1995》，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该文归纳了可能促成中国学派兴起的三点因素：当然中国的伟大制度变迁；西方（主要是美英）经济学范式存在重大缺陷；与现代经济学相通的中国古典文化可为中国经济学提供滋养。

国学派”成为消解在酒杯中的块垒？我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这场危机确实凸显了中国学者进行智识反思的必要，尤其是对经济学知识的普适性的反思——如果它在其原产地的适用尚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期待它能独自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知识基础和智识动力。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历史流转，在当下表现为另外一个“崭新”的故事。毛泽东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¹⁰³ 文艺家如此，其他的“家”未必不是如此。当然，阶级话语如今已经不合时宜，意识形态应该是经济政策的概括而非指南。对中国经济改革与体制转型，经济学家无需担当社会历史批判的职责，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设计服务于转型社会的经济福利与分配正义的各种经济政策，而政策的基础则是可以相对有效地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危机提供给学术界的一个规范含义是，作为政策科学从业者的经济学家最好抛弃狭义的意识形态，保守或自由之政策选择背后的哲学驱动力应该是实用主义和温和的功利主义。资本主义的巨轮碾碎传统伦理之后，广义上的意识形态竞争与冲突已经成为社会常态，这种情况下的话语交锋必须以——常识意义上的——理性的知识论为基础，否则便不可能。在我看来，保守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及其极端版本无政府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策当下不仅已经在经济学“宗主国”失宠，而且在知识论上难以圆融。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对中国尚不成熟更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极为有害。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应该矫枉过正甚至因噎废食，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备及其在此无法展开讨论的政治根源决定了左翼的经济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在中国语境中的限度。就像我们没法选择其他类型的经济学（因而抹去了其限定语“西方”）一样，基本的经济制度也别无选择，这是一个超越价值评判的历史事实。

反驳者或许会说，“风水轮流转”，这些论辩不过是相时而动。修辞性的回答是：除了相时而动，别无其他。¹⁰⁴ 每一种表现得有原则的论辩，都是一种不诚实的相时而动。须知，“学者最大的罪过”并非“相时而动”，而是“循规蹈矩”。¹⁰⁵ 意识形态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它在现实中常常成为阻碍学者自我超越和创新的束缚。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波斯纳以结束本文——无论他对经济危机的分析是对还是错，也无论他的法律经济学存在何种缺陷，至少他求真、求知的意志和反思、超越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的一些论敌批他善变，而他的门徒则如此赞美自己的导师：“波斯纳的变化，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源自他所探究的问题或质询的对象，没有人能够声称波斯纳属于自己这一派。”¹⁰⁶ 而波斯纳在谈到他那位哲学家朋友时是这么说的：“理查德·罗蒂，在世的最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一定在干着什么正确的事情，因为他既被左派咒又被右派骂……”¹⁰⁷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赞美么？与经济学家共勉。

二〇〇九年八月初稿，
二〇一一年十月改定。

本文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3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¹⁰³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3页。

¹⁰⁴ 说到底，这是达尔文进化论的铁律。

¹⁰⁵ 参见 Lawrence Lessig, “The Prolific Iconoclast,” *The American Lawyer*, December 1999, p. 105.

¹⁰⁶ *Ibid.*

¹⁰⁷ Richard A. Posner, *Overcoming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44.